

一、中共推進醫藥領域反腐工作觀察

開南大學人文社會學院教授兼院長張執中主稿

- 中共 2013 年即推動醫療領域反腐工作，今年新冠疫情後擴大動員規模全面整治，約 180 名公立醫院院長、科主任等醫療機構負責人被查，醫藥學術會議延期、微信群被解散。
- 習近平推動「打房」、「雙減」、「醫藥」反腐，意圖消弭社會長期壓力，緩解醫保基金負擔，凸顯其「共同富裕」目標獲社會支持，強化政策正當性。

（一）前言

據中國大陸媒體統計，自 2022 年初開始，各地累計有近 93 位院長、書記等醫療系統官員被查。今年以來，僅第 1 季就有 62 名醫療衛生系統人員被查，其中醫院院長落馬 36 名（21 世紀經濟報導，2023.03.27）。而在各家媒體的報導中，多有提到雲南普洱市人民醫院回扣案例：一臺進口價 1,500 萬元的醫療器械直線加速器，醫院以 3,520 萬元買入，中間的回扣被醫院院長吃掉 1,600 萬元（新浪網，2023.08.08）。事實上，在 2019 年第十九屆中紀委第三次全會中，便提到開展民生領域專項整治，聚焦群眾痛點難點焦點，解決教育醫療、環境保護、食品藥品安全等方面侵害群眾利益問題，嚴肅查處基層幹部貪污侵佔、虛報冒領、截留挪用、優親厚友等行為（人民網，2019.01.11）。

（二）習執政推促醫療領域反腐

習近平執政以來，衛生部門便已投入整治醫療採購和醫療服務中。自 2013 年以來，以國家衛生計生委、國家發改委、工信部、財政部、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商務部、稅務總局、工商總局、食品藥品監管總局等 9 個部門，組成「糾正醫藥購銷和醫療服務中不正之風部際聯席會議」，辦公室設在國家衛生計生委醫政醫管局（中國政府網，2014.01.22）。2019 年後逐步強化對醫藥領域反腐，隨著機構改革，部門調整後，如 2020 年 6 月，國家衛健委、工信部、公安部、財政部、

商務部、國家稅務總局、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國家醫療保障局、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等 9 部委聯合印發《關於印發 2020 年糾正醫藥購銷領域和醫療服務中不正之風工作要點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其糾風工作要點在為醫藥購銷領域和醫療服務劃清行為紅線，深入清理群眾身邊的醫療行業亂象。集中力量全面排查清理涉黑涉惡的醫鬧醫托、「黑護工」及「黑救護車」；堅決懲處患者身邊「微腐敗」，對各級各類醫療衛生機構從業人員利用職務便利，在醫療服務中索取或收受患者及其家屬贈送的「紅包」、禮金或其他不正當利益等違規違法行為(人民網，2020.06.09)。不過，近 3 年因新冠防疫需求，未見全面性動員整治。

今年《通知》改由 14 部門(國家衛健委、教育部、工信部、公安部、財政部、商務部、審計署、國資委、國家稅務總局、國家市場監管總局、國家醫保局、國家中醫藥局、國家疾控局、國家藥監局)聯合印發，以保證糾風管理體系與部門職能調整的實際情況相銜接，推進全行業「受賄行賄一起查」。明確對醫藥領域行政管理部門在普惠制認證、行政許可、日常監督和行政執法等行業管理過程中的不正之風問題，行業組織或學(協)會在工作或推進業務主管部門委託事項過程中的不正之風問題，醫藥生產經營企業及與之關聯的經銷商、醫藥代表「帶金銷售」問題進行重點整治(人民網，2023.05.12)。

不過，今年 7 月，紀檢監察系統召開動員會，部署紀檢監察機構配合開展全國醫藥領域腐敗問題集中整治，指出集中整治醫藥領域腐敗問題是推動健康中國戰略實施，深入開展醫藥行業全領域、全鏈條、全覆蓋的系統治理，集中力量查處一批醫藥領域腐敗案件，形成聲勢震懾(中紀委國家監委網，2023.07.28)。8 月 15 日，國家衛健委有關司局負責人就全國醫藥領域腐敗問題集中整治工作，再次召開記者會說明。強調六項重點工作(人民網，2023.08.15)包括：

1. 醫藥領域行政管理部門以權尋租；
2. 醫療衛生機構內「關鍵少數」和「關鍵崗位」，以及藥品、器械、耗材等方面的「帶金銷售」；
3. 接受醫藥領域行政部門管理指導的社會組織利用工作便利牟取利

益；

4. 涉及醫保基金使用的有關問題；
5. 醫藥生產經營企業在購銷領域的不法行為；
6. 醫務人員違反《醫療機構工作人員廉潔從業九項準則》。

（三）打擊醫藥「帶金銷售」緩解醫保基金負擔

導致今年中國大陸各地已有約 180 名公立醫院院長、科主任等醫療機構負責人被查，其中不乏首席專家、全國優秀醫院院長，包括卸任或退休多年者，範圍從社區醫院到「三甲」醫院，至衛生系統官員。並有多個醫藥領域學術會議延期，多個醫藥領域的微信群被解散（端傳媒，2023.08.15；香港新聞網，2023.09.01）。各地也紛紛跟進反腐，比如陝西通報今年醫療機構累計退還紅包 3,470 個，並展開自查自糾，以整改問題 7,390 個。上海也印發整治要點，分別為「開展高值耗材專項檢查」、「開展整治『紅包』、回扣專項檢查」，以及「開展醫德醫風教育主題活動」（人民網，2023.08.16）。

中國大陸學者認為，長期以來，醫療領域存在幾個深層次問題。在醫院市場化改革過程中，長期存在醫療資源不均衡、費用不透明、醫院管理層權力集中、監管不完善等（中國網，2023.08.18）。因此在中紀委的案例中，首要關注「一把手」腐敗。一些「一把手」把醫院作為「私人領地」，如湖南省郴州市第三人民醫院原黨委副書記、院長谷東陽在擔任院長的 12 年中，研究通過重大項目，將醫院項目指定給其熟人或特定關係人承攬。而關鍵崗位中，如廣西紀檢監察機關在「十三五」期間，在 4,000 多件醫療衛生系統案件中，涉及各級醫院和鄉鎮衛生院約 2,500 件，且其中近 50% 違紀違法人員是掌握藥品、醫療設備等採購資源的縣級以上醫院和鄉鎮衛生院領導、科室或部門負責人（中紀委國家監委網，2021.01.20）。

再者，藥企將大量資金投入銷售環節，催生醫療腐敗，污染學術環境。此次集中整治明確指向醫藥領域生產、供應、銷售、使用、報銷等重點環節，藥企正是反腐的「風暴眼」（中國網，2023.08.18）。據 BBC 報導，通過醫藥上市公司的財報，去年在中國上市的 5,000 多家公司

中，僅有 1% 左右，即 57 家公司的銷售費用佔收入比重超過 50%，而其中醫藥企業就佔了 40 家，其中不乏行業龍頭企業。這意味著，100 塊錢的藥，銷售費用佔 50 塊，而製藥成本、包裝、物流、行政成本、研發以及利潤等佔另外 50 塊（BBC 中文網，2023.08.21）。比如貴州 1 間上市藥廠老闆向該省食藥監管局藥品註冊處長行賄 100 多萬元人民幣，而該公司去年共出資召開「學術會議」、推廣會議 1,300 多場，累計出席人數達 12 萬人次。其中，主要是專家、醫生等參與的學術交流會議 700 多場，由醫藥經紀與醫生交流、介紹公司產品的科室會議 600 多場。據報導，A 股上市的 492 間醫藥生物公司年報發現，2013 年至 2022 年，「銷售費用」達 2.27 兆元，這個天文數字，大部分就是變相行賄的「帶金銷售」（香港新聞網，2023.09.01）。

第三，醫療費用快速增長、人口老齡化，給醫保基金帶來較大壓力。2023 年 1-5 月，醫保基金支出增速同比增長 23.3%，遠高於收入增速 8.2%，醫藥購銷等領域的腐敗行為正是醫療費用快速上漲的重要推手之一（中國網，2023.08.18）。因此華爾街日報認為本次的醫藥反腐，是中國「降低醫療成本」的獨特行動（華爾街中文網，2023.09.23）。

中共「二十大」前後，中央大力整頓政法、金融系統，並進行一波人事清洗。前者是查「對黨不忠誠不老實的兩面人，確保政法隊伍絕對忠誠可靠」；後者則是「堅決懲治金融風險背後的腐敗問題」。而今年以來，整治的目標也轉向「醫藥」領域，而該領域和教育、住房，一直被稱為改革開放後的「新三座大山」。習近平任內推動「打房」與「雙減」，到當前「醫藥」反腐，可以看出習意圖消弭社會長期的壓力，凸顯其「共同富裕」目標與強化社會支持。然而，「打房」效應引發新一波經濟壓力，在「醫藥」領域，目前這一波反腐運動，意在整治目前醫療體系內的尋租與利益輸送，打破當前的利益格局，華爾街日報追蹤中國大型製藥商和醫療設備公司股票表現的滬深 300 醫藥衛生指數今年迄今下跌了 15%，遠超同期滬深 300 指數 3.5% 的跌幅（華爾街中文網，2023.09.23），接著將引發那些連鎖效應？能否導向新的制度發展，解決「看病貴、看病難」，仍待未來觀察。

二、中國大陸房地產、金融等企業債務違約影響

中華經濟研究院第一研究所副研究員吳明澤主稿

- 中國大陸疫後經濟復甦不如預期，且在三道紅線政策未有改變下，房企違約、破產事件層出不窮，房市需求降溫、房企資金斷鏈，成為現在最嚴重的金融風險。
- 中共官方雖提出《金融 16 條》政策救市，但效果不如預期，若經濟持續表現不佳，民眾信心無法恢復，房企違約風險短時間將難以降低，甚至可能外溢到金融體系，造成系統性金融風險。

（一）前言

自 2016 年習近平提出「房住不炒」政策後，中國大陸歷時最長、影響最大、對房企壓力也最重的「打房」就此展開，至今此政策大方向一直沒有重大的變化。如今疫情、通貨緊縮與債務問題更壓著中國房企喘不過氣，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則是 2021 年初實行的「三道紅線，四檔管理」監理要求，收緊房企的銀根，使得眾多房企營運出現嚴重的困難。2021 年恆大集團爆發嚴重的債務違約後，房地產市場即風波不斷，房企倒閉留下大量「爛尾樓」亦引發 2022 年 7 月的拒繳房貸潮。地方政府為了拆解炸彈，雖然在政策上略有放鬆，並要求「保交樓」政策，但掐緊房企喉嚨的「三道紅線」政策卻聞風不動，房企違約與倒閉的情況難以改善。根據標普統計，過去 3 年已有超過 50 家房企違約或無法償還債務，若情況持續惡化，未來甚至可能外溢至金融體系，造成嚴重的金融風險。另外穆迪亦在 9 月 14 日將中國房地產業展望由穩定調降至負面。謹梳理近來中國房企與金融企業債務違約相關事件，並討論中國政策相關處置政策，與分析其可能之影響。

（二）近期陸房企與金融企業債務違約情形

2023 年以來，較為重要與受人矚目的房企與金融企業違約或幾

近違約之事件，包括：2023 年 1 月，曾在 2020 年躋身千億俱樂部的時代中國控股表示，為促進對離岸債務的整體管理，將暫停支付 6 筆美元債，成為 2023 年中國大陸第一家違約的房企，該公司亦被穆迪將其公司家族評級由 Caa1 下調至 Ca，並將公司的高級無抵押評級從 Caa2 下調至 C，展望維持負面。

而今年最受矚目的不外乎就是碧桂園的「技術性違約」事件，碧桂園曾為陸房企的優等生，2017 年在全中國大陸房地產銷售金額和銷售面積獲得雙料冠軍。然而在中國大陸緊縮房市政策後，碧桂園亦遭受衝擊，房市銷售大幅衰退。2022 年銷售金額僅 2,314 億元人民幣（以下同）較前 1 年大幅減少 55%，2023 年前 7 個月只有 733 億元，再衰退 50%。2023 年 8 月 3 日，穆迪將碧桂園的信評由 Ba3 降至信用風險更高的 B1「非投資等級」、同月 10 日再調降至 Caa1、同月 31 日再降至 Ca。8 月 8 日，碧桂園未能按時支付兩筆在新加坡交易所上市美元債 2,250 萬美元的債券利息，形成「技術性違約」，使其在上海證交所掛牌債券跌幅 20%、深交所掛牌債券也因跌逾 20%被臨時停牌。

儘管後來碧桂園與債務人進行債務協商，成功將其 6 檔境內債進行展延，也支付了原本應在 1 個月前就要支付的 2 筆美元債利息，但仍有 2 檔境內債尚未與債權人完成協商，且 2023 年與 2024 年到期的境外債仍有 7 檔，實質違約的風險仍在。

同月，中國大陸再次傳出知名房企「SOGO 中國」財務出現問題，主要經營商業地產出租，其業績報告揭露欠稅高達 19.86 億元人民幣，造成部分銀行借款本金的 42.32 億元人民幣可能發生交叉違約風險。

最後，房企的債務風險延燒到金融領域。中國大陸房企融資來源除了發行債券或向銀行貸款外，不少房企亦透過信託公司或資產管理公司進行項目融資。而中植集團（中植系）與其眾多金融公司是該市場的巨頭之一。據彭博社報導，中植集團未能兌付逾期理財產品，涉及的資金至少有 9,400 萬元人民幣。中植集團是最大的中國大陸資產管理公司，管理資產達上兆元人民幣，涉獵金融、地產、教育、科技、新能源等，目前仍控制或參股宇順電子、ST 天山、凱恩股份等 8 家

上市公司，但這些公司各自面臨著或退市、待售或虧損的困境。中植集團也是中融信託的第二大股東，持股比率約為 33%。上海證交所於 8 月 11 日公告中融信託未能如期償付高收益投資產品，涉及資金達 3,500 億元人民幣。

(三) 中共官方處置政策與成效

在爆發大型房企違約與停貸潮等對房市甚至金融市場造成嚴重衝擊事件後，中國人民銀行與銀保監會於 2022 年 11 月發布《關於做好當前金融支持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工作的通知》(俗稱《金融 16 條》)，主要內容包括穩定房地產融資、積極做好「保交樓」金融服務、積極配合做好受困房地產企業風險處置、依法保障住房金融消費者合法權益、階段性調整部分金融管理政策、加大住房租賃金融支持力度等六方面。陸媒稱該政策「力度空前」，且將房企債務延期與支持性貸款，有助緩解房企流動性壓力，而保交樓政策亦可提升購屋者信心，似乎有信心可以順利解決房企違約問題。

然而，如前所述 2023 年開始中國大陸房企違約的情況相較過去沒有任何的改善，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趨勢，連房企資優生一碧桂園都出現債務違約的徵兆。根據英國金融時報指出，保交樓政策實行至今，因為找不到信用良好的開發商，放款率僅有 1%，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銀行取得中國人行的專項貸款後，還必須核發一筆金額加倍的配套貸款，給予停工建案融資，但這些銀行卻不願向陷入困境的建案放款。

而且雖然《金融 16 條》由政策性銀行提出數千億的專項貸款，但金額相較之下根本杯水車薪。媒體引述地方官員說法，2 個批次共 4,000 億元人民幣的專項貸款，約可發放給 400 萬戶房源，但僅恆大一家待交付房源就達到 150 萬戶。即使《金融 16 條》鼓勵銀行持續貸款給房企，但銀行為本身風險考量，基本上只會對風險較低者進行貸款，能透過專項借款完成交付的，多是主體架構已經基本完成，但幕牆、外立面、窗戶等裝飾工程未完成的建案。建築業第三方資訊平臺「百年建築網」對全中國大陸範圍內 1,114 個項目的保交樓交付進度進行調研，截至 2023 年 5 月底，在保交樓部分僅華南、華北交付

進度較好，比例達 56%和 40%，但西南和華中地區交付比例僅 15%和 16%。

最後，《金融 16 條》對房企延長貸款的期限已經快到了，但效果仍然有限，因此中國人民銀行與銀保監會於 2023 年 7 月，將《金融 16 條》適用期限統一延長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希望以時間換取空間，能降低房市債務風險。

（四）陸企業債務違約之可能影響

中國大陸此波房市的問題除了是過去高槓桿營運下造成的累積風險外，亦包括中國大陸民眾對於未來經濟前景不安、對房市信心不足而造成的需求不足，以及「三道紅線」這個勒住房企脖子的政策所致。儘管官方已略有放鬆對於房企的緊縮政策，並提出上述的《金融 16 條》強化對房企的金融支持，然房企的債務問題仍然嚴重。據陸媒初估，未來 1 年中國大陸 289 家房企共約 9,600 億元人民幣（以下同）債務將到期，央企及國企占最多達 80%。另外，2023 年 9 至 12 月平均每月到期債務近 800 億元，而 2024 年 3 至 4 月單月債務到期規模甚至超過 1,000 億元。

2022 年底中國大陸經濟開心迎來解封，2023 年第 1 季出現亮眼的經濟成長率（4.5%），第 2 季更是到達 6.3%，然而此亮麗的數據並非是經濟真實的表現，更多是去年第 2 季的基期過低所致。即使官方持續加大寬鬆的政策，但 PMI 指數自 2023 年 3 月至 8 月已連續 6 個月處於榮枯線（50%）以下，而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同比自 2 月以來亦均低於 1%，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PPI）更是自去年 10 月以來均呈負值，通貨緊縮的疑慮持續加深。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會（IMF）的預測，2023 年中國大陸經濟成長率僅 3.8%，而明年雖然回升至 5.5%，但未來將持續下降，2025 年為 4.1%、2026 年為 4%，2027 年後將降至 4%以下，經濟要如過去之高速成長已非常困難。以 2023 年 8 月底來看，出口累計成長率已降至-5.6%，除了外貿不振外，以往帶動其經濟成長的主要動力如消費與投資均呈現疲軟的情況，對經濟前景的悲觀使人民更難以負擔買房的龐

大支出，對房地產的需求不足會更加深房企經營的困難與違約風險。

另外，陸房企經營不善與房市違約風險亦將造成其金融體系承受非常大的壓力，房地產相關貸款占整體銀行業貸款比重接近 1/4，占中長期貸款比重更高達 35%，而其不良貸款自 2014 年起開始快速上升，由 263 億元增加到 2020 年的 1,339 億元，之後統計金額雖仍未發布，但可預料的是仍會持續成長。值得關注的是，房企的負債結構中，金融負債占比約 31%，其中銀行貸款不到一半，其另外的近 7 成是個人預收房款和上下企業墊款，亦即若房企經營不善而破產倒閉，其所牽連的產業上下游均會受到嚴重衝擊，而該些產業向金融業的貸款亦會遭到波及，而連帶造成金融業的風險。

綜合以上分析，在短期內中國大陸房企經營的情況難以顯著的改善，房企違約甚至破產倒閉的情況仍會持續發生。而且中國房地產投資占其 GDP 約 13%，若考慮供應鏈則約占 30%，房地產業的產業關聯效果非常大，一旦房企違約與倒閉潮爆發，恐怕不是如過去的小型銀行擠兌、P2P 爆雷風險般，中共可以輕易控制，引發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可能性將會大增。雖然官方已提出若干提振房市的政策，但看來效果非常有限，且在持續進行寬鬆的貨幣政策使利率持續下降下，房地產的需求似乎亦並未有所起色。若中國大陸經濟持續下行，民眾需求持續萎縮，房企銷售難以提升，則再多的支持政策恐怕也無濟於事。

三、近期中國大陸嚴重天災、公安事件之輿情觀察

東海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兩岸關係研究院執行長潘兆民主稿

- 中國大陸今年 7、8 月天災事故累計逾 2490.5 萬人次受災，直接經濟損失 753.7 億元人民幣，更引起民眾重新檢視政府治理、建設、重建經費運用等相關問題。
- 近期重大公安事故起因於安全意識薄弱、監管不力等因素；另官商勾結、企業瞞報亦助長事故頻繁發生。民眾為逝者哀悼外，對官方延遲通報事故等情況也表達不滿。

（二）前言

中國大陸自今年 7 月以來，遭逢洪水、颱風、地質災害和乾旱等多重自然災害，福建、重慶、北京、河北、內蒙古等地受災嚴重，尤其首都北京市遭遇百年一遇的洪災，號稱「600 年從未淹水」的紫禁城也浸泡水中。

事實上，中共自然資源部 7 月 15 日就召開 2023 年「七下八上」關鍵期地質災害防治工作調度部署會議，強調防汛關鍵期的災害防範工作形勢嚴峻，要求針對地質災害風險區管控、預警資訊發布和回應、工程建設領域的防災責任落實、宣傳教育和應急演練等方面存在的問題不足，做好補短板、堵漏洞工作，努力避免類似事故災害再次發生。然而，後續華北京津冀、東北黑龍江、西南重慶及廣東等地都發生大雨氾濫成災，對民眾生命財產安全造成重大衝擊，農作物損失，又發生在中國大陸經濟復甦萎靡之時，對其經濟社會發展及民眾生活造成巨大打擊。

（二）災害讓民眾重新檢視政府工作

依中共應急管理部的 7、8 月自然災害情況數據，有高達 2,490.5 萬人次受災，直接經濟損失人民幣 753.7 億元，加計上半年的經濟損失，自然災害的經濟損失升至 1,136 億人民幣，對經歷近 3 年疫情封

控、債務問題嚴峻的地方政府財政來說是雪上加霜。另一方面，災害更引起民眾重新檢視政府治理、建設經費運用等相關問題。

1. 民眾質疑巨資打造的「海綿城市」

中國大陸自 2014 年起即大力推動「海綿城市」計劃，綜合採取「滲、滯、蓄、淨、用、排」等措施，最大限度地減少城市開發建設對生態環境的影響，將 70% 的降雨，就地消納和利用，包括北京、重慶等 30 個城市，嘗試「海綿城市」的各種方法減輕洪水影響，例如道路和行人道轉用透水物料，利用屋頂花園、地下貯水槽和其他特徵類似海綿的設施，以吸收大量降雨，然後導引至河流或水庫中，並試圖恢復濕地和自然水道、創建更多的綠色空間。官方也在 2020 年宣稱城市建城區 20% 以上的面積已達到目標要求，預計 2030 年城市建城區 80% 以上的面積可以達到目標要求。

外界估計中國大陸「海綿城市」計劃涉及 6 兆元人民幣的龐大投資。然而，從 2021 年鄭州水災到今年的華北、東北、西南等重要城市遭遇水災的重擊，受災嚴重的河北涿州民眾指出，根本不是百年一遇的暴雨問題，而是排洪設施、城市基礎建設有問題。這些災難讓人質疑當局斥巨資打造的「海綿城市」計劃成效，路透社則引述官方數據指出，中國大陸 654 個主要城市中，約有 98% 會受到洪水和積水的困擾，在極端天氣事件增加下，城市防災規劃似乎已跟不上氣候變化。

2. 河南鄭州重建資金運用、截流問題受關注

河南省財政廳今年 7 月 28 日發布《關於 2022 年度省級預算執行和其他財政收支的審計工作報告》，追蹤 2021 年 7 月河南鄭州、新鄉等多地特大洪澇事件後的重建審計情況，指出包含項目推進緩慢、虛報 22 個項目開工或完工，有災後恢復重建資金不合規範 4.05 億元人民幣，縣級融資平臺截留災後恢復重建資金 3,091.28 萬元人民幣等情況。

報告引發網民及輿論批評，北京官媒《光明日報》旗下的「光明網」發表評論質疑：國家和政府劃撥的專項救災資金，為甚麼沒有用到老百姓身上？又是誰如此膽大妄為？監管核查又在哪裡？國家的

錢，老百姓的錢，必須明明白白，必須一查到底。

（三）公安事故揭露監管缺失、瞞報等問題層出不窮

1. 企業瞞報死傷事故

今年 2 月 25 日貴州省黔西南州貞豐縣三河順勳煤礦發生頂板崩塌事故，造成 14 人死亡，直接經濟損失 2,288.47 萬元人民幣，事故係因支柱強度不足、斷裂，導致頂板大量傾斜推垮釀成礦難事故，調查過程還發現該礦 1 月 13 日就瞞報死亡事件。

陸《中國新聞周刊》則披露山西代縣的礦業公司「精誠礦業有限責任公司」多年來瞞報多宗礦難事件，涉及多名礦工死亡。山西官方今年 7 月 30 日公布調查結果，指該公司近 20 年瞞報生產安全事故 40 宗、死亡礦工 43 人，對礦工家屬採威逼利誘、私下達成高額賠償、簽訂「封口協議」等方式，蓄意逃避責任、懲處。

2. 官方延遲通報事故

6 月 21 日寧夏銀川當地知名富洋燒烤店發生氣爆事件，造成 31 人死亡，7 人輕重傷，重大工安事故登上陸社群微博的熱搜話題，網民除了為傷者祈福、逝者哀悼外，不少人對事件通報的速度表達不滿，認為事故發生後 12 小時，等到救援行動都結束了，新聞、照片、影片才開始發布。

3. 官商勾結無視公共安全

5、6 月端午連假前後，中國大陸接連發生多起因安全意識薄弱，監管不力所導致的公安爆炸事故。5 月 1 日上午，中化集團位於山東魯西化工雙氧水生產區，發生爆炸火災，現場冒出巨型蘑菇雲，造成 9 死、1 傷、1 失聯。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王宏偉指出，這類違規從事化工生產的「小化工」企業，就如隱藏在社會角落裡的「定時炸彈」，背後的官商勾結，使地方政府及行業部門的監管流於形式，嚴重影響公共安全。另有評論指出，6 月是「安全生產月」，全國上下都在搞活動、提振經濟，但最根本的安全卻流於形式。

毫無疑問，嚴重的自然災害、公安事件是中國大陸最大的隱患，

《自然災害與地球系統科學》期刊亦研究指出，中國大陸未來面對的氣候風險相當嚴峻，中國科學院研究人員估計，如果全球變暖 2°C ，中國大陸的洪水經濟損失，可能是全球變暖 1.5°C 的兩倍。尤其是，災難發生的時機，更非常不利於各地的經濟發展，由於 3 年動態清零政策的成本，已然耗盡各地政府儲蓄，膨脹債務問題，又面臨天災襲擊，自然災害與公安事件的影響，勢必嚴重打擊地方經濟及社會穩定。

四、美中升級科技戰影響及觀察

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所長洪春暉主稿

- 美國透過高科技管制壓制中國大陸半導體發展，美中科技戰由 5G 領域轉向半導體，美國聯合盟國共同對中國大陸實施多邊出口管制，削弱其高科技領域之影響力。
- 中共認為美方將技術、貿易問題政治化，以國家安全為由，實則打壓中方發展。中共亦對美採取反制，如嚴審美國企業購併交易、對美商產品實施網路安全審查、錄緒等半導體材料出口管制。
- 對臺廠而言，中國大陸與非中國大陸的兩邊市場生態雖有不同，但都很重要。從競爭的角度，臺灣長期要面臨的對手，絕對不只是中國大陸廠商，而是全球各領域的頂尖大廠。

（一）美中從貿易戰升級為科技戰，從 5G 打到半導體

2018 年美國總統川普宣布對中國大陸多項商品加徵關稅，中間經過多輪談判無果，最後中國大陸也對美國商品加徵關稅予以反制，美中貿易戰正式展開，雙方輪流提高關稅使貿易戰逐漸升溫。在全球 5G 通訊技術與產業話語權的爭奪戰中，美國於 2019 年 5 月 15 日把華為及 70 家關聯企業（如海思半導體）列入「實體清單」。美國進一步透過高科技管制去壓制中國大陸半導體技術發展的可能性，也使得科技戰由原本的 5G 領域轉向更為關鍵的半導體領域。美國也透過「瓦聖納協議」推動與盟國共同對中國大陸實施多邊出口管制，削弱中國大陸在高科技領域之影響力。同時美國持續蒐集中方高科技研究機構與企業之動態，針對中共在軍事、人權方面具有潛在威脅性之機構或企業納入實體清單，透過滾動式更新，鎖定具體的管制對象，以強化出口管制的成效。

2020 年 12 月 18 日美國以與解放軍有關聯為由，將中國大陸晶圓代工領導業者中芯國際等 80 家中企列入實體清單，限制其取得極紫外光（EUV）曝光機等 10 奈米以下半導體製程設備，防堵中國大陸自主開發生產 7nm 等先進製程運算晶片。美國不僅限制美國業者出售半導體先進製程晶片或設備予中國大陸企業，更力促臺灣、日本、

韓國、荷蘭等國之半導體晶片與設備業者配合，全力防堵中國大陸在半導體先進製程技術的發展。

（二）全球將半導體列為國家戰略產業，推動區域供應鏈發展

受 COVID-19 疫情和韌性供應鏈影響，全球已將半導體列為國家戰略產業，各國政府如美國、日本、韓國、歐盟與中國等紛紛推動半導體產業振興相關政策，試圖扶持本土半導體製造產業以及加強與海外半導體產業合作。除廠房設備補助與租稅優惠外，在先進半導體技術的研發投資也是各國高度關注重點。

2022 年 8 月美國「晶片與科學法案」生效，將投入約 530 億美元用於半導體，規劃補助建廠及租稅優惠，以建立先進邏輯晶片產能與韌性供應鏈。2022 年 2 月歐盟提出「歐洲晶片法案」，提供約 430 億歐元的公共和民間投資，打造歐洲在地的晶片供應鏈，目標是到 2030 年將歐盟在全球晶片的比例從 10% 提高到 20%。2023 年 6 月日本經產省公布修訂後的「半導體與數位產業戰略」，目標是將國內生產的半導體銷售額從目前的 5 兆日元，增加到 2030 年的 15 兆日元。日本於 2021 年會計年度編列 6,170 億日圓，對投資日本境內先進半導體的事業進行補貼，如臺積電、鎧俠/威騰及美光在日本的設廠或擴廠。2021 年 5 月 13 日，韓國政府公布「K 半導體戰略」，預計在未來 10 年投資 510 兆韓圓，希望能於 2030 年將韓國建設為全球最大的半導體產業供應鏈生產基地。中國大陸則是利用內需市場支持半導體發展，積極提升半導體自主能力和自製率，投入「大基金」一期 1,300 億人民幣、「大基金」二期 2,000 億人民幣等強化半導體設計、製造、封裝、核心設備研發等能量。「十四五」規劃中積極發展第三類半導體。甚至傳出中國大陸推出「大基金」第三期，計劃融資達 3,000 億人民幣。

（三）美國持續加強對中國大陸先進半導體技術的管制

在晶片法案確定之後，美國隨即轉而聚焦對外，2022 年 8 月美

國宣布將輔助 3 奈米以下環繞式閘極 (GAA) 場效電晶體 IC 設計所需之電子設計自動化 (EDA) 軟體列入對中國大陸的出口管制清單。這是從 IC 設計端的源頭就防堵中國大陸發展高階邏輯運算晶片。這是繼限制中國大陸業者如中芯國際等取得 EUV 曝光機以後，另一防堵中國大陸發展半導體先進製程技術與元件的重要措施。

2022 年 10 月 7 日美國發布對於中國大陸先進電腦以及半導體技術進行一系列出口管制，進一步擴大限制範圍，試圖透過管制來遲滯中方半導體技術發展，並減緩其科技和軍事發展，降低中國大陸對美國及全球的潛在競爭威脅，美國這些管制已對中方先進邏輯晶片和高階記憶體形成限制。2023 年初美國進一步和日本及荷蘭達成協議，一同限制能製造先進晶片的半導體設備出口到中國。荷蘭宣布將對中國限制出口先進 DUV 機臺，而日本針對 23 項半導體設備將加強管制等。美國 2023 年 6 月時傳出甚至擬擴大禁止更多 AI 晶片賣給中國。

2023 年 8 月 9 日美國總統拜登簽署行政命令，限制美國投資中國大陸的半導體、量子電腦和人工智慧等領域。美國對中管制已經從切斷晶片和半導體設備供應鏈、切斷人才供應鏈等，進入到切斷資金供應鏈的新階段。未來不排除美國會進一步禁止投資中國大陸其他關鍵技術。

(四) 美國半導體科技管制對中國大陸的影響

美國對中國大陸的半導體科技管制對中國大陸半導體技術與產業的發展造成了影響。其中受到影響較大的次產業包含 IC 設計產業、IC 製造產業與半導體設備產業等，而中國大陸在管制之下，積極發展自主技術、建立自主半導體供應鏈，長期而言將對全球半導體產業的發展形成衝擊。

華為及海思被美國列入管制清單對中國大陸 IC 設計產業而言，無疑產生不小衝擊。2019 年海思為中國大陸最大的 IC 設計業者，並在全球 IC 設計業者中排名第 6 (74 億美元)。但 2020 年美國晶片管制禁令衝擊下，海思營收成長幅度不如預期，但仍在全球 IC 設計業者中排名第 7 (83 億美元)。在無法委託臺積電代工製造 5G 手機晶片下，

海思 2021 年營收快速萎縮（僅 16 億美元），較 2020 年減少 81%，全球排名也滑落至第 15 位，同時喪失中國大陸 IC 設計產業領導地位，取而代之的是比特大陸與紫光展銳，分別名列全球第 11、12 位。海思在 2022 年的表現更加不理想，全球排名滑落至第 20 位，營收僅 11 億美元。中國大陸的豪威科技、紫光展銳、中興微電子、北京兆易創新等廠商營收都超越了海思。

美國對中的設備禁令將對中國大陸晶圓代工產業造成衝擊，雖然近年中芯國際的營收仍持續成長，但未來無法取得如先進的 DUV 及 EUV 曝光機臺等 10 奈米以下先進製程所需之製程設備，只能被迫將資源轉向發展成熟製程相關技術，例如 28 奈米技術節點。2022 年 10 月，禁令進一步涵蓋 14/16 奈米以下高階邏輯製程、18 奈米以下 DRAM 記憶體製程，以及 128 層以上 NAND Flash 記憶體製程所需之設備，首當其衝的就是 NAND Flash 領導業者長江存儲及 DRAM 領導業者長鑫存儲，將受限於美國設備禁令無法往前推進。中國大陸恐將失去主流記憶體競爭力，僅能聚焦於利基記憶體市場。

（五）中國大陸透過內需市場支持自主半導體供應鏈發展

面對美國加強管制，中國大陸積極投入自主半導體供應鏈發展。在「十四五」政策規劃中以國內需求「內循環」帶動半導體產業發展。另外，「大基金」一期和二期也針對半導體產業重點領域進行投資，到近期傳出的三期，可說是舉全國之力，透過內循環支持自主半導體供應鏈的發展。

在政策與經費支持下，中國大陸半導體產業快速發展，IC 設計家數從早期的幾百家，成長到 2022 年的 3,243 家。晶圓代工產業方面，以中芯國際為首，各主要晶圓代工業者紛紛投入擴產，持續增長的產能為中國大陸的內需應用市場提供支持。製程設備方面，北方華創等半導體設備業者積極開發自主技術的半導體製程設備，以避免受到美國進一步的限制，在 28 奈米、40 奈米成熟製程領域陸續取得成果，而中微半導體的電漿蝕刻設備更已打進一線晶圓代工廠的先進製程。IC 封測方面，江蘇長電為首的 IC 封測業者近期也積極開發先進封裝

技術，透過多晶片封裝提升晶片效能。2023 年 4 月 6 日中國大陸也成立全國集成電路標準化技術委員會，加速 IC 標準制定等工作。上述這些發展都代表了中國大陸半導體供應鏈在美國半導體管制之下，致力於自主化的成果。

（六）中國大陸的相關反制

面對美國科技管制，中共駐美大使館嚴重斥責美方，認為美方將技術、貿易問題政治化，以國家安全為由，實則打壓中國大陸發展。中共透過一些作法回應，例如嚴審美國企業購併交易、對於美商銷中產品實施網路安全審查、鎂鍍等半導體材料出口管制。2023 年 5 月 21 日中方以美光晶片產品「未通過網路安全審查」為由，依照法規，所有涉及關鍵訊息基礎設施的單位都必須停止採購美光產品。美光來自中國大陸市場營收佔總營收占 16% 比重，若再乘上資料中心等關鍵資訊基礎設施應用比重 20%，約影響美光營收 3%，即美光預測其營收將受到低個位數到高個位數百分比的衝擊。中國大陸是否進一步擴大審查至其他美國業者則是未定之數。

2023 年 7 月 3 日中共為維護國家安全和利益，決定對鎂、鍍相關物項實施出口管制，包括其化合物在內，自 2023 年 8 月 1 日起正式生效。任何相關物項出口均需向商務部提出申請，並提交所有相關細節，包括出口目的地、買方和使用場景等相關細節。臺灣半導體等電子業者對於鎂、鍍的使用需求多集中於美、日的「深加工產品」，而中方雖然為鎂、鍍主要出口國，但由於純化技術不足，主要以出口「初級產品」，故我業者較不會受到中國大陸出口管制措施的「直接衝擊」，但長期而言仍可能因上游供應商原料成本上升導致價格波動受到「間接影響」。另一方面，中國大陸內部通訊產業對於歐美業者主導的砷化鎂與氮化鎂等射頻元件、功率放大器等有高度需求，若管制嚴重影響歐美 IDM 與臺系晶圓代工業者生產相關元件而致供應短缺或成本上揚，反將為中國大陸通訊及相關應用產業造成衝擊。

（七）結論

美國與中國大陸從貿易戰轉向科技戰，進入全球高科技產業話語權的競爭，特別聚焦於半導體產業。美國藉由出口管制，防堵中國大陸取得先進半導體製程技術與晶片。而因應美國在半導體技術的封鎖，中國大陸半導體產業被迫聚焦於成熟製程與應用，並積極發展自主技術及供應鏈。

國際間對半導體的相關管制確實對於全球半導體產業與業者有一定影響，但對於美中半導體產業競爭以及全球半導體供應鏈的運作尚未有決定性的結果。考量美中在市場經濟與半導體供需方面均有高度的相依性，中國大陸所提出的回應可能希望藉此增加與美國溝通與談判的籌碼，並以大內需積極扶植晶片自主化發展。美中角力仍屬於進行式，後續的發展仍充滿變數，也將持續影響全球半導體供應鏈版圖的變化。對臺灣廠商而言，一邊是占全球半導體市場3成商機的中國大陸，一邊是占全球7成商機的美日歐等非中市場，未來兩邊市場生態雖有不同但都很重要。另外，從競爭的角度，臺灣長期要面臨的對手，絕對不只是中國廠商，而是全球各領域的頂尖大廠。

五、近期中共高層外事訪問之觀察

政治大學外交學系教授兼日本研究學位學程主任張文揚主稿

- 近期中共高層外事訪問凸顯習近平時期對外「戰狼外交」特質，不尋求與西方國家緩和，企取得多數發展中、南方國家支持，增強國際話語權。
- 習近平選擇性地參與國際重要會議，王毅出訪東南亞，都展現中共亟欲擔任議題設定的關鍵行為者，鞏固既有的友共成員，持續嘗試降低國際、區域的反中聲量。

（一）前言

中共的對外關係在習近平 2013 年上任以來，一反過去如江澤民、胡錦濤等採取「韜光養晦」的對外政策，以具侵略性及與西方國家對陣的態勢為特徵，發展出被稱為「戰狼外交」的特性。期間不僅屢屢見到中共外交部發言人在多項議題上強力反駁西方國家，也看到中共駐外人員公開批評駐在國當地的各項政治、經濟與社會事務。除了引發西方國家對中共後續和平崛起的疑慮之外，也增加雙邊在多項議題合作上的阻礙。

從這些發展來看，中共現在的策略，並不在於尋求與西方國家的緩和，而是嘗試如何在國際事務上，取得多數發展中或是南方國家的支持，在後續的國際各項議題上增強話語權的可能性。近期習近平與今（2023）年 7 月回鍋外交部長的王毅之外事訪問行程，就可以作為兩個例證。本文擬從近來中共高層外事訪問的過程與成效，驗證上述的觀點。

（二）近來的中共高層出訪案例

習近平在今（2023）年 8 月 23 日赴南非參加金磚國家高峰會。習在缺席開幕式以後，也沒有參加金磚國家峰會的工商論壇。儘管習近平的舉手投足或是缺席某些場合都引發諸多揣測，不過，在這次峰會之中，主要還是達成以下幾項結論。首先，便是增加 6 個國家進入金

磚國家成為正式會員：阿根廷、埃及、衣索比亞、伊朗、沙烏地阿拉伯以及阿拉伯聯合大公國，使得金磚國家增加到 11 個。其次，在去美元化上達成共識，期望就跨境支付以及國家貨幣合作等議題，在 2024 年喀山舉辦金磚峰會之前提出報告。

9 月 9 至 10 日在新德里召開的廿國集團（Group of 20, G20）峰會，中共由國務院總理李強代表出席，期間並會晤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就臺海問題交換意見。比較令人注目的是在這次的峰會之中，觀察家與媒體普遍認為印度利用這次的機會取得最大的成果。除了接納會員國多達 55 個的非洲聯盟（African Union, AU）以外、也擱置發表譴責俄羅斯發動侵烏克蘭戰爭的聲明。

在 7 月 25 日回鍋出任外交部長以後，王毅於 8 月 10 至 13 日出訪新加坡、馬來西亞與柬埔寨 3 國，並受到 3 國最高領導人的接見。除了在新加坡重申 3 月習近平訪星時提出的《關於建立全方位高質量的前瞻性夥伴關係的聯合聲明》，也在洪森（Hun Sen）將近 40 年的柬埔寨首相一職交棒給兒子洪馬內（Hun Manet）以後，由王毅的出訪代表了對柬埔寨新政權的支持與承認。

（三）對中共近期外事訪問的幾個重點觀察

從習近平以及王毅的訪問來看，可以說中共在議題上亟欲掌握關鍵行為者的作法與想法：在鞏固既有的友共之上，進一步且積極地扮演其角色，並嘗試降低反中的聲音。舉例來說，以這次金磚峰會的主辦國家與區域來看，中共與非洲關係的發展相當深遠且全面，多個調查顯示非洲對中共的印象是較為正面。中共在非洲的長期經營使得美國在近年提出的非洲戰略都更具壓力，舉例來說，美國的對非戰略架構基礎，當屬 2000 年 5 月通過的《非洲成長及機會法》（African Growth and Opportunity Act, AGOA），期望能夠豁免或是降低非洲產品進入到美國的貿易障礙。後續在歐巴馬時期提出的幾項對非政策，則是以基礎建設為核心。但是，受到中共對非援助「不附加任何條件」（no strings attached）的特色影響，中共已經是非洲最大的貿易夥伴。美國必須一再調整其對非政策，例如從川普的新非洲戰略提倡高品質與透明的貿

易交往，暗示中共與非洲貿易往來之間的不透明性，到拜登在美非領導人峰會上強調「開放社會」，以便能夠避免非洲境內有害的外國勢力持續影響非洲。而中共在非洲的經營也吸引如俄羅斯重新重視非洲，日本加強對非關係，英國與法國等前殖民母國則嘗試修補與加深前殖民地之間的關係。

至於金磚峰会的主辦國—南非，也可以看到中共與南非關係的發展。中非關係的發展在 1994 年結束長期執行的種族隔離政策，由民運領袖曼德拉（Nelson Mandela）當選總統後 4 年，就在 1998 年與中共建立外交關係可見。種族隔離政策結束以後，受到非洲國家對南非制裁放寬的影響，南非對於全非的影響力在近十幾年迅速增加，近年來南非與中共的關係發展日趨緊密，這也有助中共進一步奠定它在非洲的影響力。而正受到制裁的俄羅斯總統普丁（Vladimir Putin）一開始也受到南非總統拉瑪佛沙（Cyril Ramaphosa）邀請，受到南非反對黨抵制以後才改派外長出席。此舉也進一步證實金磚國家至少不反對當前俄羅斯在俄烏戰爭中的立場，也以去美元化挑戰西方國家對普丁的制裁。

再者，金磚峰会增加的新成員國，都是區域或是次大陸中的重要成員。埃及與衣索比亞各是北非以及東非大國，埃及甚至是聯合國在討論增設不具備否決權的常任理事國的建議名單之一。至於剛透過中共斡旋在今（2023）年復交的沙烏地阿拉伯與伊朗，則具備突破美國在中東地區重要盟邦（沙）以及進一步鞏固與拉攏美國敵對國家（伊）的意涵。與新興開發中共家的合作或是掌握「全球南方」（Global South）國家的議程設定，都有助中共後續在國際舞臺上發揮影響力。因此，習近平參加金磚峰会時缺席部分的會議，並不削弱中共在金磚峰会中的影響力。相對的，正因為習近平選擇性地參與國際重要會議，反而凸顯了中共對金磚峰会的重視。

王毅出訪東南亞的作法亦同。一份在 2020 年進行的民調顯示，10 個東南亞國協的成員國之中，如果需要在美中之間選邊，則有 7 個國家會選擇與中共結盟，僅越南、菲律賓與新加坡傾向選擇美國，這樣的結果並不意外。因為領土主權聲張的關係，越南與菲律賓長期與中共關係緊張；新加坡長期以來在美中之間審慎選擇，復以需要美國

持續提供先進武器以及美星之間的防衛合作。不過，王毅此行可以看成是對美國為了圍堵中共，在南亞聯合印度的反制措施，就算無法爭取支持，也至少讓東協其他成員國在前述的領土議題上保持中立或是分裂的立場。東協向來主張以多邊主義與中共進行磋商，然 10 國若口徑與步調一致地反對中共的主張，則將不利中共在南海的進一步擴張以及目前的主權主張。

(四) 結語

最後，在今(2023)9月召開的聯合國大會習近平與王毅均沒有出席，改派國家副主席韓正。在紐約召開的聯合國大會由於探討的重點依舊圍繞在去年以來的烏克蘭議題，且過去以來聯合國已經成為美中之間的競爭場域，無法讓中共在前述的會議之中具備舉足輕重或是吸引國際目光。加上美中關係依舊維持在低谷，諸多嘗試恢復雙邊首長對話的努力及成果均不明朗。因此，對習近平與王毅而言，不參與或許是比較好的處理方式。

只是國際政治理論中，會將國際組織視為摩擦雙方化解歧見避免衝突的良好場合，因為每年固定舉辦的會議，就如同建構了固定溝通管道與平臺，國家元首與外交官若真心希望可以改善關係，則勢必會尋找機會積極參與。若迴避參與某些場合或是反其道而行，僅積極在「同溫層」之間活動，則勢必影響國家解決紛爭的機會與可能性。今年還有 11 月在舊金山舉辦的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並預期拜習將會見面。若後續活動又因此破局，雙邊關係的持續低迷將可以預期。

然而，我方也應該審慎因應。在諸多的外交場合及領域都是依據成員國的數量決定投票結果以及議程設定，民主國家的政治制度以及價值觀，不一定與中共爭取支持的國家一致，且中共也可能藉由民主國家定期選舉的特性，干預甚至左右選舉結果。我國除應該深化並加強現有與民主國家的合作以外，如何藉由如人道援助或是民間往來等方式在其他國家爭取支持，威信也是可以抵銷中共外交攻勢的作法。

六、近期中澳關係觀察

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教授趙文志主稿

- 中澳關係近期回暖，對澳洲來說主要是因為美國戰略微調、澳洲政府政黨輪替，因而採取和緩雙邊緊張關係作為；對中共而言，由於經濟制裁無效，同時為了突破美國戰略圍堵，改善與澳洲關係有其必要，這些因素促成了近期雙邊關係改善。
- 兩國關係雖說改善，但美中關係激烈競爭持續、澳洲對中共建立影響力的企圖疑慮未消、澳洲自身戰略選擇以及澳洲公民的人質事件，都對雙邊關係投下變數。

（一）前言

中國大陸與澳洲雙邊關係曾有過一段很長的蜜月期，在這段蜜月期當中，兩國經貿關係快速增長，中方成為澳洲最大貿易夥伴。2018年中國大陸占澳洲出口的比重高達34.1%；同時，澳洲自2007年開始成為中國大陸對外投資第二大國，累計投資達900億美元，僅次於美國的1,000多億美元。此外，中國大陸目前在澳洲擁有的農地，也僅次於英國，是澳洲第二大地主。這些密切的關係讓中方對澳洲的影響力大增。除了經貿手段之外，根據澳洲媒體報導，中共還試圖以金錢手段（大量政治獻金）拉攏（收買）澳洲政治人物，建立對澳洲政治的影響力。為此，澳洲國會因此在2018年通過2項反外國干預法案，澳洲政府並以國家安全為理由，否決了中國大陸企業對澳洲的多項投資¹。

隨著新冠肺炎疫情的發生，澳洲政府提出呼籲，認為國際社會應該對於該疫情的源頭展開調查。此舉引起中國大陸政府高度不滿，隨即對澳洲展開報復。中共以澳洲企業低於市場價格出售葡萄酒，違反了世界貿易組織（WTO）規定為理由，對澳洲葡萄酒課徵高額關稅。除了葡萄酒之外，澳洲生產的大麥、煤炭、木材、海鮮、農產品等都陸續被中方施加懲罰關稅。

¹ 王曉玫，「中共如何利用民主摧毀民主—專訪《無聲的入侵》作者漢密爾頓」，報導者，2019年4月12日。

面對中共的壓力，澳洲一方面積極分散其產品市場，尋求其他可以替代中國大陸的出口市場；另一方面，則參加了由美國發起，日、美、印、澳組成的「四方安全對話」(Quad)，以及澳、英、美三邊安全夥伴關係(AUKUS)，加強與美國的戰略合作。雖然這些對話與合作都沒有言明是針對那個國家而來，但主要還是為了應對中共崛起後日益強勢的對外作為所引發印太地區安全與國際秩序受到侵蝕與威脅而來。也因此，澳洲積極參與這些機制與合作亦是為了因應來自中共的脅迫，這讓澳中雙邊關係更加緊張。

然而，自去年(2022)開始，雙邊關係開始了改善跡象。雙邊高層官員開始接觸並釋放出對話和解的訊息。2022年11月，中共領導人習近平與澳洲新總理艾班尼斯(Anthony Albanese)在印尼G20峰會進行會晤；同年12月澳洲外交部長訪問中國大陸，與中共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舉行第六輪澳中外交與戰略對話，並出席澳中建交50週年紀念活動；今年(2023)8月中方解除對澳洲進口大麥徵收反傾銷稅和反補貼稅的實施期限；雙方因為新冠疫情調查而終止3年的第七屆澳中高級別對話也於今年8月在北京恢復舉行；艾班尼斯還接受習近平的邀請，預計將在今年內訪中國大陸。這一連串的事件顯示澳洲與中國大陸關係已經開始產生改變，然而為何會產生改變，是本文主要探討的重點。

(二) 為何中澳關係的破冰？

1. **美國拜登政府對中戰略的微調：**美國戰略的微調也改變了美國盟邦對中的政策與作為。拜登政府上任後，除了延續川普的若干對中政策與對抗衝突作為外，也宣示了與中國關係的微調，其認為美中關係是該競爭之處競爭，該合作方面合作，該對抗的地方對抗。也因此，美國持續強化與盟邦的關係以應對中共帶來安全、軍事上的挑戰與威脅，也在科技上圍堵中國大陸，對中實施一連串科技禁令，但拜登政府也調整川普時代全面對抗的作為，積極尋求與中國大陸在經貿、氣候變遷等議題的對話與合作。因此，拜登政府派遣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John

Blinken)、財政部長葉倫(Janet Louise Yellen)、商務部長雷蒙多(Gina Marie Raimondo)與氣候特使凱瑞(John Kerry)等高級官員相繼訪問中國大陸。美國這樣的戰略作為，對於身為美國盟邦的澳洲來說，當然也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這使得澳洲開始試圖改善與中國大陸的雙邊關係，特別是經貿關係。所以澳洲外交部長黃英賢(Penny Wong)在「澳洲媒體俱樂部」(National Press Club of Australia)發表演說指出：「在與中國大陸的關係裡，我們將保持冷靜和一致性，繼續堅持我們執政以來做的事，在我們能合作的地方合作，在必要的地方表達反對，明智地處理雙方的分歧，最重要的是，參與並積極追求我們的國家利益²」。顯然這與美國的步調是一致的，這是促使了澳洲開始改善與中國大陸關係的第一個因素。

2. **澳洲政黨輪替：**不管是通過 2 項反外國干預法，或是禁止了具有監控疑慮的華為 5G 通訊設備，以及要求對於新冠肺炎調查的呼籲，都是在立場上偏右自由黨領導下的政府所展開的作為，這使得澳中兩國關係開始惡化。直到中間偏左的工黨艾班尼斯政府 2022 年 5 月勝選上臺，取代先前的右翼政府後，澳洲政府開始轉變了對中政策的立場，在美國戰略微調的背景下，澳洲新政府開始積極想與北京修復外交關係，解決在國防、貿易、外交、政治上的衝突。澳洲高層官員恢復到北京的訪問，艾班尼斯也接受邀訪問中國大陸。所以在政黨立場上，由於立場較為親中的工黨重新執政，再加上美國政策的微調，讓澳洲新政府展開與中關係正常化的政策，使得兩國關係產生與過去 3 年不一樣的發展情勢。
3. **經濟制裁失效與突破美國戰略圍堵：**相對的，對中共來說，近 3 年對澳洲的經濟制裁並沒有產生具體效果。澳洲政府加大開發原有的市場，過去分居澳洲出口排名的 2~5 名的國家：日本、韓國、臺灣和印度，制裁前的 2019 年與 2022 年相比，這些國家都對澳洲商品採購成長超過 100%，從而抵消了中國

² 陳艾伶，「《日經亞洲》解析中澳關係：外交冰凍三年後，艾班尼斯政府如何與北京重修舊好？」，風傳媒，2023 年 04 月 24 日。

大陸自 2020 年開始對澳洲主要出口行業的打擊。再加上，中方仍高度依賴澳洲鐵礦石，使得其持續從澳洲進口大量鐵礦石。因此，重新利用澳洲政府有意改善雙邊關係的契機，打破過去的僵局，成為中共政府的第三個原因。此外，面對美國極力拉攏澳洲進行對中的戰略圍堵，這使得當澳洲新政府有意改善對中關係時，中國大陸也順水推舟，在突破美國戰略圍堵的指導原則下，把握契機回應澳洲新政府的期待，讓兩國關係開始回暖，都成為兩國改善關係的重要因素。

（三）中澳關係從此一帆風順？

1. **美中高度競爭結構未變：**澳洲與中關係仍離不開國際體系權力結構。在美國與中共仍在持續進行激烈的戰略競爭下，體系其他行為者仍然難以避免受到體系結構的衝擊與影響，澳洲也不例外。面對美中之間的激烈競爭，再加上中共之前的強勢態度，與美國在安全、戰略與軍事上的合作，符合澳洲國家利益，只要美國持續對中國進行戰略圍堵，澳洲要獲得美國在安全、軍事上的協助，配合美國政策就成為必然之結果，而這對澳洲與中國大陸要展開和緩乃至合作的雙邊關係來說，成為一個重要的變數。
2. **中共試圖建立的對澳洲政治影響力未消：**雖然澳洲為了削減外國（中共）的影響力，通過了反外國干預法，但是這是否就意味著中共不再試圖建立這樣的影響力，或是中共已經建立的影響力被消除，仍有待時間檢驗。然而，只要中方仍試圖通過各種手段影響澳洲政治，這就成為兩國在發展關係過程中的負面因素。雖然中方一再聲稱不會干預他國內政，但從過去經驗來說，中共常常透過合作的手段建立起對手國對自己的依賴，進而形成影響對方的工具，甚至成為制裁的武器。也因此，中澳兩國關係回歸正軌後，特別是經貿關係恢復正常後，如何尋求一個平衡的雙邊關係會是澳洲未來的挑戰，也是兩國關係未來發展的另一個變數。

3. **澳洲自身的戰略選擇：**從國家利益以及國防安全的角度觀察，澳洲脫離美國而與中國結盟的可能性並不高，也不可能離開AUKUS 與 Quad；此外，澳洲還是情報共享組織「五眼聯盟」（Five Eyes）的重要成員。再加上，澳洲與美國在價值觀、意識形態、理念上與中共相比都相近許多。因此，澳洲與美國合作的戰略選擇，將會影響到澳中兩國關係的發展。如果澳洲不會放棄與美國進行戰略合作，美中之間又進行激烈競爭，則對於澳洲來說，其在發展與中方的雙邊關係，將會不可避免受到美中大架構的影響。稟此，中澳兩國關係發展仍有變數。
4. **人質問題未解：**澳洲公民成蕾與澳洲籍華人作家楊恒均於 2020 年遭中共拘留與控告從事間諜活動，直至目前為止都仍未獲釋。這引起澳洲國內民意很大的關注。中方常使用人質外交的方式，透過以外國公民在中國大陸從事間諜活動方式抓捕，使其成為中共與外國政府談判的人質籌碼，以逼迫對方國家讓步這樣的方式，常成為外國與中方互動交流時常會因此感到需要特別顧慮的地方。因此，目前澳洲公民因間諜被中共持續關押的問題未解，如何有效處理這 2 位澳洲公民在中國關押的事情，也將成為兩國關係發展的重點。

（四）結語

中澳關係隨著澳洲新政府工黨上臺後，產生了變化，兩國高級官員開始對話。因為新冠疫情調查事件而中斷的兩國高層往來也開始逐步恢復。這似乎都標示著兩國關係逐步和緩。而其主要緩和原因，包括了美國拜登政府的戰略微調、澳洲政黨輪替，以及中共對澳洲經濟制裁的失敗與中方尋求突破美國的戰略圍堵。然而這是否就意味著兩國關係將會一帆風順？本文認為長期來說，外部結構的美中關係未見和緩、中共對澳洲建立影響力的企圖疑慮未消、澳洲自身戰略選擇以及澳洲公民的人質事件都對兩國未來關係投下變數。

七、中共整肅火箭軍事件觀察

國防大學政戰學院中共軍事事務研究所助理教授陳育正主稿³

- 火箭軍高層人事調動可能不僅涉及政治層面的問題，還可能反映中共對於核武力量的現代化和專業性整合的重視，包括：打破從火箭軍內部遴選司令員、加強核武和常規彈道導彈的能力，以應對國際局勢的變化和美國的威脅。
- 這次人員異動，長遠而言並不會改變習近平對於「打造強大戰略威懾力量體系」的建設要求；對我國與區域安全來說，則產生嚴重的威脅。

（一）前言

8月1日是中共人民解放軍（以下簡稱共軍）的建軍紀念日，也被稱為建軍節，通常會舉行盛大的慶祝活動和儀式，同樣，今年的建軍節亦不例外。只是中共領導人習近平於7月31日出席中央軍委的晉升儀式，宣布王厚斌和徐西盛2名中將成為新任火箭軍司令員和火箭軍政治委員（以下稱政委），並晉升為上將，確定原任火箭軍司令員李玉超、政委徐忠波同時遭到更換，這項人事異動可能間接證實香港《南華早報》日前報導稱火箭軍前後任司令員等重要幹部遭中央軍委紀律檢查委員會調查等傳聞。特別是從習近平這次拔擢來自中共海軍副司令員王厚斌和南部戰區空軍政委徐西盛兩人分別擔任中共火箭軍司令員和政治委員，也就是跨軍種調整火箭軍司令員與政委，無論是在時機點與人事任命方式等部分，自然引起外界的關注和猜測。

筆者除了從這次火箭軍高層人員異動的意義做論述，並且提供個人有關火箭軍可能對臺海與區域影響的觀察。

（二）火箭軍司令員與政委同時更換創下先例

這次中共火箭軍司令員與政委同時的換人，已經引發外界相當大的關注。就目前的資料消息來看，仍然不清楚李玉超與徐忠波實際被

³ 本文為作者個人見解，不代表作者單位立場。
大陸委員會

調職原因究竟為何，以及為什麼是現在被換掉、不清楚李或徐兩人是否有被重新分配到不同的職位。目前部分分析提到習近平本質上對於軍隊高層仍有不信任，可能涉及包括貪腐問題、其他不正當行為，只是對於中共當局沒有公布官方的正式消息，筆者個人觀察認為在這次火箭軍領導高層異動，除了包括涉及政治層面的問題，還有意圖朝向火箭軍軍事專業化的可能性，都不應被排除。前者是指這次人事異動涉及上述的各種原因，使得習近平必須徹底更換軍隊高層幹部，後者則是強調共軍火箭軍須有「核常兼備、全域懾戰」的戰略要求，整合「三位一體」（陸、海、空核武力量）的核反擊與核威懾能力。因此，打破傳統由火箭軍內部拔擢幹部晉升司令員的標準。

首先，在政治層面來說，習近平持續強化軍事治理，確保「反腐正軍」仍是「強軍」目標的首要工作。從歷史上看，如果中共領導人認為武裝力量若偏離共產主義教條、變質變色，理所當然地盡一切努力重新掌控，包括從習近平上任後對軍隊的「反腐正軍」可以看出如同毛澤東對他的國防部長彭德懷和林彪等大規模清洗，一定程度反映對軍隊高層不信任。中共國防大學退休教授劉明福，也是《新時代中國強軍夢》的作者認為，習近平主政時期共軍的頭號敵人之一就是「腐敗」，因此，過去透過籌組新的「中央軍委紀律檢查委員會」、「中央軍委政法委員會」，以及「中央軍委審計署」等監督機制，象徵有關反腐鬥爭問題是堅持打持久戰。

除了在媒體的報導中提到李玉超等人遭中央軍委紀律檢查委員會調查，以及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在 2023 年 7 月下旬開始多次參加公開會議，期間都不約而同強調對軍事治理的重視，包括在 7 月 20 至 21 日舉行的「全軍黨的建設會議」提到全面從嚴治黨和全面從嚴治軍的必要性，中央軍委副主席何衛東也在這場會議裡重申持續整肅紀律與反腐的決心；幾天後，習近平在 7 月 24 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同樣提及軍事治理的重要性，並且指示加強軍費管理和監督，深化特定領域的治理。這些公開具有指標性的會議都反映出習近平在「軍隊反腐」方面的堅定立場，恰巧的是，這些會議舉行時間點不免讓外界聯想媒體報導火箭軍高層幹部遭調查的傳聞。因此，若從政治角度來看人事調整，本文認為自然不能排除火箭軍高層真的遭到整肅可能

性。

進一步而言，若是火箭軍高層涉及到政治層面的問題，恰好反映出習近平長期以來推動的反腐工作，實際上並未能根本解決軍隊腐敗的問題。共軍仍然是一個自我管理的官僚組織體系，即使習近平擔任軍委主席一職，然而共軍軍官幹部負責包括反腐敗機構、軍事法庭和政委的運作，形成一種結構性的關係，同時在其國內也沒有司法、民意機關，以及媒體等機制來監督，使得反腐問題持續存在。

其次，這次火箭軍高層將領的調整，可能反映習近平強化火箭軍「核常兼備、全域懾戰」的整合能力。儘管過去共軍將領或軍官跨軍種任職主官、政委的情況以前就有發生過，但這是習近平時期以來，首次一個軍種的 2 名最高領導職務同時間被其他軍種的將領所取代。新任火箭軍司令員王厚斌是從海軍所遴選出來，打破過去第二炮兵（以下稱二炮）、火箭軍的司令員從內部資深幹部所拔擢的做法。一般來說，一個軍種的最高領導階層通常由該軍種內部出身的幹部從中遴選出來，這些高級將領經過多年職務歷練和準備後，才能擔任高級領導職務。若與被免去司令員職務的李玉超作為比較，他在 2022 年 1 月接任火箭部隊指揮官職務之前，他的軍旅生涯大多在二炮與火箭軍服務，時間可能長達 40 年之久，期間先後歷練多個重要軍職，包括火箭軍基地司令員和參謀長。王厚斌則是海軍出身的幹部，主要的部隊歷練是在海軍部隊與水面艦。根據公開資料來看，他先後擔任過東海艦隊副參謀長兼舟山基地副司令員、南海艦隊參謀長，其中，任職南海艦隊參謀長期間，有可能負責監督核動力戰略導彈潛艦的經驗。就實務上來說，王厚斌或許與海軍核打擊能力有些微的關聯性，但是他對陸基火箭部隊來說幾乎沒有經驗，筆者認為王厚斌可能需要花費一定時間來瞭解火箭部隊的組織結構、任務、運作方式以及運用軍事力量的能力。值得注意的是，有關中共核武打擊能力當中，如何管控「三位一體」的聯合運作問題一直備受外界質疑，包括火箭軍如何與海軍核動力戰略導彈潛艦與空軍轟炸機等核武器攻擊平臺進行相互指揮與控制。因此，透過海軍出身的王厚斌接掌火箭軍可能亦符合目前建軍的需要，提升「三位一體」的聯合運作。

至於政委徐西盛來說，情況則有所不同。火箭軍新任政委徐西盛

是空軍幹部，部隊經歷則是擔任政委為主，同時過去也有政委跨軍種擔任要職；另外，在共軍體制當中，政委的職責實際上是管理人員和黨的工作，這些專業職能在不同軍種之間更容易轉移。綜合來說，火箭軍領導階層的同時更換，長遠而言並不會調整習近平對於「打造強大戰略威懾力量體系」的建設要求，也就是火箭軍高層人事異動，並不會改變火箭軍發展方向。

（三）中共火箭軍的發展仍對我國安全挑戰帶來影響

毋庸置疑，中共在過去幾年時間裡已經快速擴展核導彈數量，嚴重衝擊我國國防安全與區域和平與穩定。在公開的研究資料當中，中共 2017 至 2020 年之間導彈發射旅數量從原本 29 個成長到 40 個，並且隨著新型導彈的部署，這些導彈發射旅的數量還會持續增加，北京政府也努力發展「三位一體」的核武能力。

從中共的觀點來看，快速擴充核武能力和常規彈道導彈能力對共軍而言，是可以起到穩定的作用。習近平「二十大」報告中提到「打造強大戰略威懾力量體系」，顯然指示火箭軍未來建設的方向，筆者認為部分原因在於是要對美國發展現代化核武力所做出的回應，特別是看到美國正在制定新的核戰略，以及快速提升彈道導彈防禦系統等方面能力。因此，透過快速擴大「核常兼備、全域懾戰」能力，應是回應與美國的核武現代化所帶來的威脅。

然而，中共火箭軍的快速發展對我國與區域國家來說，同樣會引起嚴重的影響與擔憂。由於俄烏戰爭的爆發，美國與北約成員國忌憚於俄羅斯可能動用核武所帶來的後果，明確表明無意出兵參戰，一定程度給予共軍提高建設核武威懾力重要啟示，尤其未來有必要留意中共當局是否還堅守過去「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畢竟要提高戰略威懾能力，調整「不首先使用核武」的政策，有助於日後如果在第一島鏈內與我國、日本、菲律賓等國家發生軍事衝突時，提高核武能量將可作為嚇阻美國或美國盟友介入。這些發展無疑會對印太地區的安全局勢產生重大影響，還可能導致緊張局勢升級。

（四）結語

中共火箭軍司令員和政委同時的職務異動引起了外界廣泛關注。目前仍然不清楚李玉超和徐忠波被調職的具體原因，以及他們是否被重新分派到其他職位。這種不確定性導致有各種猜測，包括可能與貪污和其他不當行為有關，但尚未有官方消息確認。筆者認為，這次人事調整可能涉及政治層面的問題，並且也反映出習近平對軍隊持續反腐的要求，效果仍然有限。

此外，新任火箭軍司令員王厚斌和政委徐西盛受到習近平提拔，或許意味著中共對火箭軍的發展方向和能力有新的做法，包括：打破從火箭軍內部遴選司令員、加強核武和常規彈道導彈的能力，以應對國際局勢的變化和美國的威脅。然而，這種發展將對亞太地區的安全局勢產生影響，以及導致緊張局勢升級。整體來看，火箭軍的高層人事調整和發展方向都值得密切關注，因為這會對區域和國際安全產生重大影響。與此同時，外界亦需要持續留意中共的軍事行動和核武政策，以更好地理解其行為意圖。

八、2023 年臺北上海雙城論壇觀察

空軍官校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吳建忠主稿

- 中共藉由臺北市長蔣萬安參加「雙城論壇」，延續融合發展框架，審度周邊情勢操作對臺和戰兩手策略，也凸顯陸方促進兩岸交流意願強烈，以及期望雙城交流持續紮根。
- 本屆「雙城論壇」宣傳力度不若以往，在陸方經濟成長趨緩、美中競逐的影響下，陸方致詞代表內容均強調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美好未來，透過「雙城論壇」再次強調中共對臺廣泛交流、融合發展的方向不變。

（一）前言

「雙城論壇」自 2010 年起每年輪流在臺北、上海舉行，在當前兩岸關係緊繃下，成為兩岸唯一的官方往來平臺。今年會議因對岸疫情解封，時隔 3 年首次全面恢復實體會議，也是蔣萬安上任後市長首度參加。蔣萬安在「雙城論壇」引用唐詩形容兩岸關係「恰如江河行舟」，不應該過盡千帆皆不是，成為媒體關注焦點。

（二）「雙城論壇」訴求實質對話

1. 對話內容不見「九二共識」、「兩岸一家親」

從歷史來看，「雙城論壇」是歷屆臺北市長最重要舞臺之一，2023 年臺北上海「雙城論壇」於 8 月 30 日正式登場，不同於前任市長柯文哲 2015 年首次赴上海參加雙城論壇時，拋出「兩岸一家親」以及「四個互相」的論述，2017 年更增為互相認識、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互相合作、互相諒解的「五個互相」。

這次臺北市長蔣萬安出席「雙城論壇」喊出「雙城好，兩岸好」的口號，也同時得到同行的臺北市議會議長的附和，政治意涵不言可喻。不過，論壇期間沒有與國臺辦主任宋濤見面，且全程未提「九二共識」、「兩岸一家親」。本次臺北市與上海市簽署「會展產業」、「減碳永續」以及「羽球運動」等三項合作備忘錄。蔣萬安一直談到此行

實質對話很重要，不斷重複兩岸要務實面對發展，和平爭取雙贏的口號。關鍵在於實質對話內容是什麼？市政府於論壇後也沒有進一步向國人說明。

2. 陸方交流意願強烈，安排多元行程

此次論壇凸顯陸方交流意願強烈，以及雙城交流持續紮根。從舉辦日期鄰近臺灣總統選舉，可看出中共具強烈意願推動兩岸城市交流，希望起到首長示範作用。從行程來看。這次蔣萬安與馬英九4月祭祖行程有相似之處，包括洋山深水港、上海城市規劃展示館，馬英九當初到夜市體驗庶民經濟，蔣萬安也規劃到城隍廟、豫園體驗上海夜經濟，同時規劃與臺灣青年騎自行車，並與當地臺商座談。不過，蔣萬安參訪上海保租房、青年公寓、小區食堂及當地托嬰機構的讚賞，實乃有所感而發，認真吸取上海治理經驗。

3. 雙城交流持續紮根

總統蔡英文說過要「恢復兩岸人民之間健康有序的交流」，民進黨主席賴清德也說「願意與對岸交流、合作」，對「雙城論壇」，陸委會也非常清楚的表示「樂見臺北上海雙城論壇，也會給予適當協助」。對於推動兩岸交流合作，今年論壇以「新趨勢新發展」為主題，寄託了雙城對進一步攜手推動經濟社會融合。此次論壇簽署簽署「會展產業」、「減碳永續」以及「羽球運動」等三項合作備忘錄，合作備忘錄雖不具有執行的約束力，但仍表達雙方持續交流的意向。

此次的行程重點放在經貿、運動等議題上，低調處理政治。蔣萬安在論壇上多次提及兩岸經貿交流對話的重要性，希望推動兩岸經貿往來繼續積極發展，恢復到之前的正常狀態，用外溢效應來深化紮根。

(三) 中共對「雙城論壇」的戰略設定及戰術作為

1. 戰略設定：企圖擴大示範效應，宣傳認同民族復興

兩岸城市交流之效益，在政治面可彰顯縣市長治理能力，進而有助提升政治地位。由於近期中國經濟不振，臺灣多項農漁商品銷陸遇到障礙，我國政府已開放第三地陸客來臺，陸方卻希望藉由「雙城論

壇」開啟引導效應，讓藍營縣市首長，增加對兩岸城市交流的積極態度。

對於「雙城論壇」的舉辦，許多官媒以近半版的篇幅報導，引述當地學者形容「雙城論壇」是「和平之舟、親情之舟」，批評「民進黨總是責怪對岸，讓兩岸關係敵意升高」，此舉可能分化部分民眾，增加對政府在兩岸政策的批評，以及對民主運作的失望。

進一步來看，中共雖歡迎兩岸城市交流，過去往往設有承認「九二共識」的前提條件。此次「雙城論壇」明顯降低政治意涵，過程除未見國臺辦主任宋濤，且全程未提「九二共識」、「兩岸一家親」。不過，中共官媒的宣傳基調仍為「共同努力謀求國家統一」。換句話說，臺灣縣市長與中國大陸進行城市交流時，不管是否宣稱支持「九二共識」或「一個中國各自表述」，被官媒視角報導仍有可能性。

2. 戰術作為：廣布交流管道，融合成為新常態

「雙城論壇」是歷屆臺北市長最重要舞臺之一，對照中共斷官方對話促民間交流，「雙城論壇」是廣佈交流的管道，讓融合成為新常態，正在步步落實圍臺戰略。不過，中共應正視實現和臺灣民意，放棄強加在臺灣的政治框架和軍事威嚇，中共沒有資格居高臨下對中華民國說話，兩岸必須透過相互尊重、務實對話解決問題，以溝通對話解決問題。

從「雙城論壇」來看，中共立場也決定其和臺灣政黨的互動空間，在反獨高於促統時，其在野黨較有合作空間；在促統高於反獨時，任何政黨的「不統」主張，將使兩者合作空間縮小。

(四) 結語

中共放開清零政策後，更清晰地單邊定義兩岸關係，也會更強硬地堅持並推動「雙城論壇」的「促融」路線。目前看來，其推動工作並不十分成功，因為臺灣民主價值乃選舉實踐產物，不易動搖。儘管中共擅長利用片面訊息，推進與臺灣各界人士的交流交往，主觀詮釋歸納臺灣民主的脆弱性，試圖影響臺灣民眾對民主體系的信任。

我國首都市長政黨輪替多次，基本上已經是成熟的民主體制，臺北市民對於「雙城論壇」仍有戒心，一般公民能接受以民主程序解決重大政治社會分歧的方式，具高度的民主認同感。民主體制所展現的「民主韌性」，也並非中共外部宣傳城市交流的成功，就能動搖國人對民主程序及其價值的認可與認同。整體而言，本屆「雙城論壇」基調與過去並無太大的不同，對外強調城市交流共贏、對內釋放未來促統促融的靈活彈性，其中亦兼具對臺統戰的目的。